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宗教与文化战略丛书 | 卓新平◎主编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SOCIETY

张雅平 著

本书试图全景式展现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渊源、苏联时期和俄罗斯当代的政教关系脉络、深入揭示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千年兴衰史中的规律性表现及俄罗斯文明特质中的东正教基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宗 教 与 文 化 战 略 丛 书

卓新平◎主编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SOCIETY

张雅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张雅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

(宗教与文化战略丛书)

ISBN 978-7-5097-4210-5

I. ①东… II. ①张… III. ①东正教-关系-社会发展-研究-俄罗斯 IV. ①B976.2②D75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740 号



· 宗教与文化战略丛书 ·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

著 者 / 张雅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范 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范 迎

责任校对 / 丁立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210-5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18.25

字 数 / 28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古罗斯至 1917 年	
——东正教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	14
第一节 罗斯受洗	14
一 基辅罗斯	14
二 罗斯受洗及其意义	17
第二节 东正教——历史、信仰内容与特质、教义、 建制及其他	23
一 历史	23
二 信仰内容与特质	27
三 教义	29
四 其他	34
五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建制	38
第三节 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	41
一 基辅罗斯时期	42
二 莫斯科时期	45
三 法定“三信条”	49
第四节 东正教与俄国社会各阶层	51
一 与政权统治者的关系	51
二 与农民的关系	54
三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55

第二章 苏联时期

——政教关系、教会生存与宗教研究	61
第一节 政教关系：宗教法与宗教政策	62
第二节 教会生存	67
一 受挫反抗	67
二 转变分化	70
第三节 卫国战争与教会	73
一 效力祖国	73
二 恢复形象	76
第四节 政府与教会的调控与适应	78
一 向外扩展	80
二 教会建设	82
第五节 苏联的宗教研究	85
一 关于宗教的本质、职能和社会作用的研究	86
二 关于宗教与道德研究	94
三 关于宗教心理学研究	102

第三章 苏联解体前后

——教会重返社会舞台	111
第一节 国内外背景	111
一 根本性转折	115
二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千年纪念	116
第二节 媒体掀起“宗教热”	118
第三节 立法：《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	120
第四节 出现宗教政党	125
一 起因、思想立场及目的	125
二 与共产党、国家和教会的关系	129
三 简要述评	130
第五节 教会整合	132

第六节	全方位复兴	134
一	致力教育	138
二	走进军队	142
三	重提传教	143
四	慈善救助	146
五	新的困扰	147
第七节	再立法：修改《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	151
第八节	教会的外部关联	155
第九节	社会转型期教会活动的特点	159
一	抵御外来文化威胁：各派政治力量靠近东正教会	161
二	对待政治斗争既积极又极力保持中立立场	162
三	与国家保持“自由合作”的关系	164
四	缺乏成熟的社会理论方案	165
五	大打“文化牌”，推进宗教精神深入人心	166

第四章 新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

	——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169
第一节	俄罗斯文明·传统宗教·主权民主	169
第二节	东正教会提出新的社会观、人权观	175
一	东正教会领袖	175
二	东正教之社会思想变化	178
三	东正教会的社会观	182
四	东正教会的人权观	184
第三节	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治理念契合	187
第四节	东正教会的经济诉求	192
第五节	东正教会外交战略：保持俄罗斯文化影响力	195
第六节	东正教会的迫切愿望：站稳教育阵地	198
一	宗教与教育的发展变化	198
二	教权主义扩张及其社会回应	203

第七节 政府与东正教会	205
第八节 普京与俄罗斯东正教	212
附录一 俄罗斯宗教哲学管窥	220
附录二 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实践与反思	238
附录三 俄罗斯闻识	270
名词索引	279
参考文献	282

序 论

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无非一手靠硬实力，一手靠软实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硬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创新，软实力则指价值观、社会制度、文化底蕴及其影响力。20 世纪，美苏两霸称雄世界，然而随着 20 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到 21 世纪只有美国一家独占鳌头。但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美国亦不再能为所欲为；与此同时，各国都在为壮大自己的综合实力而争夺硬、软实力的制高点。由于当今世界仍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此各国之间的软实力比拼则更加突出，其中又尤以文化战略成为国家最高层的决策者注意的问题。我国也从文化战略上考虑将文化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并重的四大任务之一。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时，我们意识到应立足于我国固有的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影响巨大，是我们占领文化发展制高点的基本要素。然而，在怎样发挥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凝聚与整合作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的思考上，我们正面临着不少难题。因此，我们也要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欧、俄、印等国家或相关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文化战略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选择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东正教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我们通常爱说文化“大概”，包括中、西、俄、印。如果不把俄罗斯这一“大概”列入其中，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古以来的世界历史便不能整全。

二

俄罗斯国土广袤，横跨欧亚。有人说，西方人信上帝，中国人信权威。而在俄罗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中国人常把俄罗斯往欧洲基督教世界划，而西方人则总把俄罗斯向东方制度上推。其实，俄罗斯就是它自己，既不属于东方，亦不属于西方，却在人类历史的坐标上有着自己赫然的位置。

关于俄国的双重性（двойственность）和双重政权（двоевластие），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它开始于接受拜占庭的东正教，强调于俄国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第三罗马”理念的提出，遂使俄国国君“黄袍加身”，即披上与拜占庭皇帝等同的冠服，俨然自居为沙皇，连其双头鹰的国徽也为其所用，日后成为了俄国的国徽。这双头鹰的寓意，有其空间象征，一头向东方，一头向西方；有其社会象征，一表世俗权力，一表东正教会；也有其时间象征，一面正对过去，一面正对未来，过去，表追溯，乃君权神授，未来，表先知，即帝国由我建。政权与教权，可谓双重领导，双重政权。

我们知道，东正教并非是在俄罗斯民族社会内部生发的，它是由统治者或说俗权植入而确立的。其动势是自上而下的，一方面是拜占庭文化的高水平位阶，另一方面是基辅大公的强大压力。这与基督教在西方的先期传播正好相反，后者从底层兴起，然后在大众中平面式传播，人们起信，犹如灵魂被点亮，然后像火炬一样一波一波传递，或者可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来描述。不独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这是横向的品格，属民间性。而这些宗教只有被统治权力接受，才会具备纵向的品格，这种品格属贵族性，如中世纪的教皇所为。同理，俄罗斯也适用这种纵向品格的方法，因为它有巨大的空间，况且，于世界文明史而言，它属于晚发者，它必须少走弯路，并有自己民族之权威领导，才能缩小与西方步伐的差距。纵观俄罗斯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两个特大事件与我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相似，一次是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另一次是19世纪上半叶尼古拉一世的“三信条”运动，即提出

“东正教”“君主制”“人民性”的口号。前者使其民族确立，后者使其民族卓立。20年前，苏联解体了，我们曾为之震惊、惋惜、痛心。当时不少国内学者发表若干时评，皆以为其社会颠覆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为不可起死回生的必然，除非恢复原有体制。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这个民族在悄然复兴，这个国家又重新立起。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真正生命，在其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其信仰和价值理念。在俄罗斯，这便是东正教信仰，东正教精神。在俄罗斯民族孤独、焦虑、生死存亡之际，国家又一次面临了选择，许多学者研究、思考、反思、论证克服二重性统治，论证改变观念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次，传统的力量又获胜了，国家和人民又一次选择了与东正教在一起。而对于一度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国家来说，东正教的复苏恰逢其时。

普京执政后历史航向渐行渐朗，转向西方的道路行不通，欧洲从来不把地处欧亚的俄国看做是欧洲国家，更不希望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崛起。普京也将继续以强硬的“主权民主”对抗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民主”，还将以独联体国家为主的“欧亚联盟”回应欧盟，而这恰恰是俄罗斯东正教固有的势力范围。国际形势多变，中国若置身事外，其欧亚联盟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所以了解俄罗斯，是我们应该做也可以做的一件要事。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①“常态”必在时间中，我们把这一“特殊性”转换为时间性的理解，称为“特殊阶段”。可以看出，这种“特殊阶段”在俄罗斯是比较短暂的，不及整个历史进程的1/10，这就是20世纪的苏联时期。我们以“常”为轨，那么，苏联就是非“常轨”，从性质上说，是“常”的变形，不是消灭，因为灭是灭不掉的。而其变形，必有内力外力的一些因素，或偶然或必然。比如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那么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亦是；再如苏联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必然，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亦为必然。也就是说，人们的思考，似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第18页。

应从研究苏联为何解体转向今天俄罗斯“怎样新生”的向度来。

如果以世界的眼光来考量，俄罗斯的特殊性非常明显：既难断定它是发达国家，也难把它算作发展中国家。不过，依笔者看，就其富裕程度和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浓郁的宗教氛围，它更近于前者。现在它已“起死回生”，归属的是自己的文化传统，即自己的“常轨”。迈出“休克疗法”的陷阱，俄罗斯在迅速恢复，虽然已无往日的辉煌，但仍显示着大国的力量。这力量不独表现在资源、工业和军事等方面，也表现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就宗教方面而言，东正教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即历史与社会的地位与身份，辅佐政府为实现其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责尽力。

究竟东正教作为一个民族的信仰，在国家困难和低谷时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似乎还少有讨论过。信仰属于精神，精神的作用虽浩大但不明显，因为它属于心理经验的事情，常常是无“物”可“唯”，无“事”可“及”，然而它要保持的是生命的常态，防止非常激变。我们从现实来看，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民族大危大难的时刻，必给予人民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心灵抚慰——斯大林的护卫尤里·斯洛韦杰夫称斯大林是一个“圣徒”，说他常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到克里姆林宫小教堂去为胜利做祈祷。命运多舛，未来难测，委之于天，可能为人之常态，因为自己的有限性，伟人如斯大林也不例外。亦即以宗教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的本能心理，反过来说，人的自然心理需要寄托，需要信仰。在这里，我们可以援引康德的观点，他把信仰（理想、理念）分为三种类型，宗教性的归为“纯粹理想”，政治性的归为“学说理想”，个人性的归为“经验理想”。第一种信仰，不一定与有形的利益和目的相关联，它是精神性的，表现为心理经验的充实与自安；第二种信仰，必与一集体、群体或阶层的利益与目的相关联，有其范围与时段的适用性；第三种信仰，与个人的利益和人生目的相关。这三种信仰，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正如卓新平先生在《重视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一文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异层性和不可比性，故此避免了二者之间舍谁存谁的被动状态。”他举例说：“列宁就曾经谈到宗教信仰者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即成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的问题。在此，他并不认为这两种信仰在同一种人的信奉、实践上会产生矛盾或冲

突，而是觉得可以做到兼顾尊重二者的共存。”^①如说斯大林“兼顾尊重二者的共存”尚有疑问，那么我们可以孙中山为例，他既信仰基督教，又提倡三民主义，并且有若干自己的人生计划，如想到晚年去建铁路、修水利等；还有普京也是个典型，他不仅信仰东正教，还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并设计自己重新回到总统的宝座上。

政治信仰的时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具永恒性的品格。而宗教与东方思想，把宇宙看做是以“大生命的充满与润泽”（牟宗三语），有我们人类所不知的大力持载，这就是说，与前者“语言”不同。从实践上说，政治信仰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并被相应的组织纪律约束；而宗教，几乎没有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甚至是罪人，在俄罗斯还有“圣愚”的传统，罪人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信仰者是否遵守教规，全在自觉。从组织上说，日久生弊，宗教组织不能免，政治组织也不能免，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崇高的理想，多数人不能，多数人只能顺潮流而动；于此涉及一个人性的问题，而改变和转化人性，是宗教之能事，而非政党之能事，政党以参政执政为旨归。看来，执政与教化当两分，各有各的社会功能，就好比“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俄罗斯似乎懂得了这个道理，因而政府让出足够的空间，让宗教组织发挥功用，而自己则把精力放在富国强兵和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事业上。俄罗斯社会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如贪污腐化、贫富差距、民族冲突等，但这都属于社会建设中的政治问题，而非宗教问题，也就是说，宗教的作用在这里是间接的。俄罗斯从震荡到稳定，其社会结构在变化中的趋向应该是合理的，尽管还有诸多未知因素，然而从实际来看，宗教组织在其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三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笔者做这个题目是既有“缘分”亦是“心仪”已久的，因为我与俄罗斯从“神交”到直接打交道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笔者在大学学的是俄语，到中国社会科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2日。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后开始接触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宗教理论，接触到苏联宗教政策和无神论思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那时东正教在苏联并没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更是几乎绝迹。令笔者对俄罗斯及东正教有深刻体验的是真正踏上了苏联—俄罗斯土地，对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三次访问，颠覆了笔者过去许多教条和陈旧的观念，也促使笔者此后一直关注与俄罗斯民族和历史息息相关的东正教。

笔者有幸在三个关键的历史时段赴俄，亲眼见证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社会变革。第一次去苏联是1989~1990年，笔者在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进修，与俄罗斯同学同吃同住整整生活了14个月。当时正值苏联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实行经济改革艰难之际，“公开性”“民主化”如火如荼，健谈的俄罗斯人高谈阔论：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如何融入欧洲、如何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笔者课余更多的是与同学喝茶闲谈，周末跟着室友去教堂，问她们信教吗，她们说只是喜欢教堂音乐。间或我们也去转转商场，商品奇缺，却能在商场门外的黑市上高价买到《圣经》。这些交往无形中让笔者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社会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自然，拜访科学无神论研究所是在计划之内的。该研究所虽在社会科学院名下，却归苏共中央直属，地位很高，办公楼似宾馆一样高档，其研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笔者在那里收集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图书馆里不光有大量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批判文章，还有不曾见到的，比如有关宗教政党党派方面的材料。1990年回国以后，根据自己在苏联的观察和体会所写的现状的东西一度无法发表，因为当时国人无法接受、不能理解，也不允许“鸦片”复兴一类的彼邦形势来扰乱国人的视听。然而接下来彼邦的变化更加让人始料不及，苏联的改制，科学无神论研究所不再受国家财政支持，那个笔者曾经熟悉的研究所很快解散，笔者认识的研究人员都自谋出路去了。笔者也从此一度转向俄国宗教哲学思想引介与东正教研究。

1993年，笔者接待了来中国访问的基里尔大主教（现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率领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笔者全程陪同了他们为期10天从北到南（哈尔滨—北京—上海—南京）的访问。这些社会精英学识渊博，对笔者领略俄罗斯民族文化有直接影响，比如古时所称“罗斯”（Русь），后来“俄罗斯”一词是怎样出现的？大牧首言：蒙古人曾

统治罗斯，他们舌头硬，在说“罗斯”时发不出第一个卷舌音（P），遂每次都要先费力地从嗓子发出“哦”的声音再带出P，久而久之，就说成了“哦”“罗斯”，所以在蒙古人统治之后的15世纪末，这个国家才被称为“俄罗斯”。此类的交流令笔者难以忘怀。这次接待，主要是参与各种会见、座谈。与教会高层近距离接触，他们对俄罗斯前途的忧心和焦虑，溢于言表；交谈中，更多的是谈俄罗斯人民对教会的期望，以及俄罗斯教会要有所作为的设想。而以往我们不考虑东正教因素或从排斥它的态度说明俄罗斯国家社会文化的历史，显然不符合彼邦的国情和事实。

1999年笔者有机会再度访俄，这是俄罗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俄罗斯经济尚未恢复到1989年解体以前，人口死亡率绝对值居全球第一！那次笔者的最大感受是沉闷。但此时教会却有所发展。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全盘西化走不通，靠别人的恩赐是不行的，也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沦入二三流的行列中去，而要复兴，就只有靠民族的凝聚力和智慧，因此他们努力去寻根，莫斯科市中心的基督救主大教堂在此国内经济最拮据、民心最低落的时候集资重建，作为俄罗斯民族灵魂的东正教重新成为俄罗斯各阶层人士的聚焦点。

时隔8年，作为俄罗斯科学院访问学者，笔者于2007年年底再一次来到莫斯科。3个月内笔者走访了科学院哲学所、民族所、情报所，也拜访了莫斯科牧首区教会人士、光顾大小教堂，尽量接触多方面的人士，以使笔者的看法中肯而客观。普京的不变式发展已使俄罗斯起死回生，总统换届大选在即，社会思想异常活跃，他们对普京政府、对教会的作用都可以自由地各抒己见。这次访问收获甚大，使笔者更多地了解了走在改革途中的俄罗斯人，这对笔者在看待俄罗斯问题时掌握分寸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学习、积累和感性的接触，都为笔者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四

本书试图勾勒了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千年史上显、隐、起、伏的命运，从文化战略的视角，考察、梳理、分析和评述东正教在各个时期的

具体背景中与俄罗斯社会的关联和作用。其着眼点，不在于理念和理论的探讨，如“姓资姓社”“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观察和表达。我们通常爱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其实“历史本来面目”难以恢复，也无由恢复，如果做宽泛的理解，我们说恢复历史常态就足以了。看待东正教会在俄罗斯今天的状况，大概应作如是观。

第一章中，笔者从东正教何以成为斯拉夫人的正宗信仰写起，描述了俄罗斯与东正教的历史渊源，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基辅时代的确立期；第二，莫斯科公国时代的自立期；第三，19世纪上半叶尼古拉一世推行“三信条”运动的卓立期。人的精神力量内在地得到了调整、聚集。作为一个民族，健康的生命力有赖于国家的动员。在俄罗斯，一是向外扩张，二是自己雄强。扩张与雄强，两者都很重要，这与其民族的生存环境有关。这就要求这个民族要坚强有力，也正是东正教培育了这一生命体。对统治者来说，它标示出一个更高的境界，对普通人来说，它给予了一个神圣的共识，一句话，它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母体。东正教有着犹太教的品格，集体被救赎，民族高于一切，“民族的统一比阶级的统一、党派的统一……更为深刻”^①。在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已经成为斯拉夫人的文化奠基；在蒙古人入侵时，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重要慰藉；此后莫斯科王公驱逐外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王国，东正教更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并与俄罗斯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俄罗斯民族自诩为上帝的特选，宗教、沙皇和民族三位一体，这就是尼古拉一世推行的“三信条”运动——东正教、君主制和民族性。在皇权与教权的合作下所奠定的莫斯科大一统帝国中，俄罗斯东正教徒更形成了一种救世的使命感。

18世纪彼得大帝实行现代化改革以后，俄罗斯国家政主教从的格局形成，这对以后直至今日的俄罗斯社会影响甚大。

1917年以前，俄罗斯宗教与民族互相所属，一个人的宗教所属是看他出生在哪个民族。宗教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被理解。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81、85页。

梁漱溟先生曾说：“我们知道，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统一，却每每都有赖于一大宗教。”“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致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① 重温梁先生这段语录，有感知像是专门指对彼邦俄罗斯的。

第二章记述苏联时期为抑制宗教采取的对策及其效果，以及教会是如何生存的。已有研究者指出：“苏联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承载了千年以来俄罗斯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弥赛亚意识的体现。苏联‘世界革命’的理想确实具有救世主义情结。这样，在反宗教的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中与之产生共鸣，于是，马克思主义遂成为‘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② 因此，“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惯于认为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别尔嘉耶夫语）。对此观点笔者很认同。

苏联时期，没有宗教的位置。可以说，在大多数时间政教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布尔什维克与东正教展开过全方位的斗争：先是政治上的打压，然后是经济领域的剥夺，最后是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批判。如果我们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采取极端做法是当时政治斗争所必需的话，那么在后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当教会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和之后配合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政策方面，仍把无神论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提到首位，将铲除宗教“残余”作为追求目标，即是脱离了实际，因此也达不到预期效果。我们看到，经过若干年，宗教与民众的联系斩不断理还乱。

笔者在这部分用了一定的篇幅综述苏联宗教理论批判的文章，看上去可能有些过时和冗长，但笔者的考虑，一是真实反映了苏联当时人文科学领域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和僵化教条主义延续的原貌，二是现今我国很多年轻党政干部对那时我们所借鉴的原装理论并不太了解，免得重复研究。

① 《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97～99页。

② 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人民出版社，2009，第6页。